

民族文化精神的巨匠

深切缅怀田汉先生

文·王复民



每每有各种盛大会议，国庆节日，国家领导人出访、迎宾，以及国际奥运会上金牌得主目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并噙着眼泪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我除了激动总带有一种酸楚和不平的心情，想起了这首歌词的作者田汉先生。

田汉是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是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然而，一直以来，对田汉的功绩的介绍和宣传远远不及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更少见有纪念或研讨活动，即使在涉及左翼文化历史而不能不提到田汉时，也只仅仅是一笔带过……此种现象，使我百思而不解。因此，有必要根据事实材料，凭借自己有限的水平，力求以历史唯物史观，进行一点回顾与分析，以正视听，并求教各位学者专家。

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开拓者

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田汉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史上有他特殊的地位。他那超人的艺术创造力和非凡的人格力量已由他沧桑多变的历史经纬，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一百多部诗情浓郁、深邃浪漫的戏剧作品，两千余首大气磅礴、激情喷涌的诗歌来证明。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于30年代初，由一批左翼文化人为主体的“南国社”（包括文学、戏剧、诗歌、音乐等方面的人才）高举“普罗”大旗（无产者之意），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官僚学衙进行了勇敢的挑战。

1929年创作的话剧《一致》第一次喊出了“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打倒我们的敌人，一致建设新的理想，新的光明……”的革命呼声。

接着，于1931年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任“联盟”的党团书记，193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表现了田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决反抗。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田汉以伟大的爱国热忱，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写出了一批鼓舞民众斗争士气的抗战戏剧，如话剧《秋声赋》、《卢沟桥》、《乱钟》等；戏曲《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并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积极组织“抗敌演剧团”，动员百姓，英勇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5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就是众多抗战歌曲中的代表作。在这首歌词中，田汉以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迫切的民族自救意

志和不屈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全国解放后，田汉以对党，对新中国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感情，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的领导和戏剧创作工作中。他新创作的话剧《文成公主》、《关汉卿》，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剧，受到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的热烈赞扬，演遍大江南北。党和政府委任田汉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及中国戏剧家协会首任主席。

纵观田汉数十年辉煌而又艰苦的人生，他有过苦闷和彷徨，也有过过失和错误，但他始终不懈追求真理和光明；他虽在汹涌而来“左”的或“右”的政治风暴中经受一些人的恶意中伤、误解谩骂，直至“文革”中对他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至死，尸骨无存。但是，他和伟大的关汉卿一样始终保持着“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的伟大精神。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田汉五十大寿的祝词中写到：“在你五十年中，至少有30年是投放在人民的事业上，在这30年中你用戏剧，用诗歌为中国人民而歌，而哭，而呐喊。你的戏剧不是戏剧，而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之缩写；你的诗歌不是诗歌，而是近30年来中国人民之哭叫；你不是戏剧家，不是诗人，而是时代的速记，人民的代言人。”这是一位历史学家以其深邃的眼光对田汉所作的公正评价。

我们再听听中国文化先驱们对田汉的评述，就可以领悟田汉不愧是一位绝伦而轶群的剧坛领袖，称得上是一代宗师。

郭沫若称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

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

洪深说：“把整个身心完全献给戏剧运动的，只有田汉先生一人。”

曹禺说：“田汉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

（见《田汉代表作》序文）

以上所举，充分说明了田汉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浅窥对田汉偏见的由来

对这样一位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文化巨匠，爱国主义的革命战士，人民的代言人，为什么在数十年风雨人生中走得那么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还对他抱有不公的偏见呢？思之再三，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30年代和鲁迅的恩怨

据资料记载，特别是董健教授在《田汉传》中所

述，由于鲁、田双方在性格及处事作风上严重的差异，再加之若干事件中产生的误解，所以鲁迅是不很喜欢田汉的，有以下例子可证明。

（1）田汉比鲁迅小17岁。田汉为人处世不很严谨，狂放粗疏，浪漫多情，往往在文化界聚会时，总喜欢扯开嗓子唱几段京戏。然而，具有深沉、冷峻性格的鲁迅就很看不惯，乃至十分反感。有一次鲁迅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先生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作家藤森成吉，鲁迅、茅盾、夏衍、田汉均在坐，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和藤森高谈阔论起来。鲁迅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鲁迅起身先告退了。

（2）关于所谓“四条汉子”问题。

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在“文革”中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田汉的不大不小的一条罪状。实际上据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中说田汉有一定的失误，但并非公然反对鲁迅。夏衍同志说：“当时我和周扬、阳翰笙约好，择日准备去找鲁迅先生汇报工作，并听取他的意见。事先约定之后，于第二天下午准备去内山书店和鲁迅会面。到了约定时间，我在美琪电影院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了周、阳之外，还来了一个田汉。“我当时就有点为难，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而且事先也没有告诉鲁迅田汉要来。可是已经来了，没有办法让他不去。我们四人上了车，到四川北路某医院附近下了车，为了安全，我们分散徒步走到了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鲁迅听取了阳翰笙对‘文总’前段工作的汇报，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但当周扬谈到年青作家的時候，田汉忽然插话谈到了胡风，并直率地提出‘胡风靠不住’，这一下鲁迅很不高兴。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

从这个事情上也说明田汉遇人遇事欠考虑，凭着自己粗疏的性格，常遭鲁迅责难。

（3）1934年，关于《社会月报》事件。

鲁迅先生给曹聚仁（《社会月报》主编）发了一篇文章，准备和所谓“革命小贩”（叛徒）杨邨人写的《赤区归来记》放在同一期发表。田汉知道后想以激将打击杨邨人，以达到阻止杨文发表的目的，便在一篇文章中用绍伯笔名说：“鲁迅曾嘘为杨邨人，现在为杨文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气量小呢？”等等。田汉以为，这样鲁迅便会起而向《社会月报》提抗议，达到打击杨邨人的目的。然而鲁迅却愤怒了，并发表文章不知名怒斥田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田汉署名绍

伯)，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于敌人以上的。”这段语录在“文革”中几乎成了名句，文艺界几乎天天、人人在运用，可见它影响力之大，除了已被打倒的文艺界名人之外，一般文艺界同志并不知道指的就是田汉。事后，尽管田汉如何向鲁迅先生解释、道歉，仍不能取得鲁迅的原谅。

(4) 1935年在南京组织演出的问题

1935年春，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后经徐悲鸿、宗白华多方营救而保释。作为“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田汉，出狱后不但不修身养息，沉寂一段时日去考虑今后的斗争方略，反而凭他一股革命热情，以及在影剧界的影响，在南京登高一呼，云集著名左翼文化人士招揽名导名演，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演出了《械斗》、《回春之曲》等进步戏剧，虽在民众中受到热烈欢迎，但右派说他“竟然到国民党心脏的南京来示威来了”。左派误解他“在南京为自己树立田汉的旗帜”（因为，当时左翼文化运动是以鲁迅为首的上海）。鲁迅知道后自然也十分不满，说：“你看，他唱戏唱到南京去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等等。在此紧要关头，夏衍和周扬在斗争策略上考虑，经商量，特派一位曹姓的同志去南京对田汉说明情况，劝其保存实力，停演收兵，返回上海。田汉一听是党的指示，即坚决服从，收兵返沪。

综上所述，说明一方面田汉在性格上的粗疏和缺乏上下左右周密思考的审慎，惯于以艺术家的激情和冲动代替政治家应有的理智和冷静；另一方面，鲁迅先生性格深沉、严谨、冷峻，在气愤时又多少有点偏执和极端，因此造成了与田汉之间难以释怀的误解。

我想，我们今天来观照这些历史恩怨，是否也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而不应当沿袭“凡是”的惯性来认定是非，从而把田汉打入“反鲁”的另类。

二、田汉做官不像“官”

建国以后，田汉担任了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首任主席等职。但是，他做官不像官，这本来是一大优点，但对田汉来说又是一大罪状。他总是以艺术家的思维和方法及处事态度去展开他的工作。最突出的一点，也是某些官方人士所看不惯的，甚至所排斥的，就是他喜欢走南闯北，深入各省市艺术机关团体了解情况，听取各方意见。而且不管是电影话剧界，还是戏曲曲艺界，都时时不忘广交朋友，处处能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周恩来总理曾说：“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

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长处。”由于田汉的平易作风，在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又令人敬佩的现象，对待田汉，几乎所有省市文化领导、基层干部及文艺界人士都亲昵地称他为“田老大”（家族排名）、“田汉同志”、“老田”或尊称他为“田老”，而从没有听人称他为“田局长”、“田主席”。这本来是一种廉政的平易作风和善于接近群众的处事态度，然而在“极左”时代，竟有人污蔑他“在文艺界自称‘老大’，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等等。特别在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在为某些被无端批判的作品说了公道话，又以恳切的心情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篇叫《必须切实改善艺人的生活》。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称文章是“丑化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反党大毒草”。幸有周总理出来说话，才幸免被戴上“右派”帽子。

在“文革”中，田汉同志所经受的苦难和迫害，更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面，田汉在狱中被迫写交代，挨批斗；另一面，在狱外，知识青年唱着田汉所撰写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歌曲上山下乡。这真是贻笑天下的中国式政治笑话；最后，田汉重病，被化名为李伍送进医院，因为是“牛鬼蛇神”，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于1968年12月10日逝世，终年70岁，连骨灰也没有保存。据田汉小女儿田野及她先生张辉同志告诉我，在为田汉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田汉的骨灰盒中没有骨灰，只放了三件田汉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个《关汉卿》剧本。

粉碎“四人帮”后，于1979年4月2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田汉先生举行了隆重追悼会，为田汉先生昭雪平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宋庆龄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追悼会。由廖承志主持，沈雁冰（茅盾）致悼词，给田汉先生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 罗松

参考资料：

- 《田汉传》董健 著
- 《懒寻旧梦录》夏衍 著
- 《田汉专集》柏彬 徐景东编
- 《田汉代表作》董健等著
-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